

民族主義啦啦隊： 中國媒體對俄烏戰爭的報導及角色

鄒瞻舒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洪貞玲*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摘要

俄烏戰爭引發全球關注，研究聚焦於與俄、烏兩國交好的中國，如何報導這場戰爭？媒體如何透過戰爭新聞反映國家與市場利益？研究採用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探討中國網路媒體——《人民網》、《澎湃新聞》如何再現俄烏戰爭。結果發現，分屬黨營與市場導向的兩家媒體，在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內容框架上存在差異，但報導中性、不偏袒任一方，符合官方立場。相關主題，則以「衝突框架」最常使用；其餘框架則包括「責任歸屬」、「經濟影響」、及「道德」等類型。而結合框架化、推理等裝置，以及潛在的文化背景現象，發現中國媒體藉由戰爭新聞，強化反美、反西方論述，扮演民族主義啦啦隊的角色。

關鍵字：反美、民族主義、俄烏戰爭、框架包裹、戰爭新聞

* 通訊作者，E-mail: clhung@nt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03 月 12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6 月 11 日

壹、前言

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全球震驚，媒體也日夜報導。戰地實況透過網路及各式媒體即時傳遞，不論遠近，閱聽人在各自的媒體空間中共同見證、參與戰爭，並透過紛雜的資訊形成不同的觀點與解讀。

戰爭議題具備高度衝突性，且牽一髮而動全身，俄烏戰爭不只影響區域和平、資源取得與經濟運作，更牽動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俄烏戰爭給予國際強權何種啟示？相較於美國與民主國家譴責俄羅斯入侵行動，與俄羅斯長期交好的中國則態度曖昧，而處在兩大強權夾縫中的臺灣也步步為營，處境受到國際關注。戰爭議題的衝突性與影響力，具備高度新聞價值，因此戰爭發生後，媒體如何報導及詮釋，受到國家利益及市場趨力影響，相當程度左右閱聽人對於遠方事務的理解（Pan & Kosicki, 1993；Topoushian, 2002）。

本研究關注中國媒體如何再現俄烏戰爭。作為他者，中國並非參戰國，但與俄、烏兩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加之媒體組成和言論管制等結構性因素，使中國媒體再現俄烏戰爭的圖像，迥然不同於西方世界。首先，從中俄兩國領導人交換意見的文章中，可看出中國官方表面抱持「中立」的態度；再者，觀察中國官媒的網路言論，主要引用俄羅斯官方論述甚至普丁的表態，例如以「特別軍事行動」取代「戰爭」或「侵略」的字眼，消息來源不言而喻。

初步觀察中國媒體的報導，與官方立場一致，試圖維持中立，但也傾向給予入侵的俄羅斯更多發言機會，似乎代表中國媒體的戰爭報導以國家利益至上，也受到中國與俄羅斯、烏克蘭兩國的外交及經貿關係牽動。

回顧歷史，冷戰結束後，中美雙邊關係紛爭不斷，而中俄間則日益融洽。2001年7月，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強調平等互利、不結盟和綜合安全等意涵，成為兩國關係重要指標。該條約加強中俄關係穩定，從而對美國形成地緣政治壓力，試圖平衡冷戰之後、美國獨大的國際局勢。

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擁有強大軍工複合工業技術卻又有經濟危機，因此成為中國獲取技術產業外援的大好目標。對中國而言，軍事外交合作轉向價格低廉的烏克蘭，同時可緩和對俄國的軍事依賴及戰略安全問題，是有利作法。故俄烏關係越不和睦，漁翁得利的便是中國，而中國在俄烏間的角色，以不損害自身利益下保持中立（林穎佑，2014；顏建發，2015；Moore, 2014, May 21）。

因此，在複雜的國際政治外交動態中，媒體如何再現遠方的戰爭事件，至關重要。本研究試圖探討，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中的報導方式與角色為何，是否受到中國媒體管制及國家利益之影響？中國的媒體如何建構他者的戰爭？以及中國的媒體結構，是否會使不同定位的媒體在報導框架及立場上有所差異？

貳、文獻回顧

為了解中國媒體如何報導俄烏戰爭，有兩大領域需要進一步認識。一方面是中國民族主義與媒體管：，作為理解中國媒體報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另一方面則是戰爭新聞再現的研究，有助於形成本文的分析角度與架構。

一、中國民族主義與媒體管制

李金銓（2004）指出，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取徑，包括民主國家的自由多元模式與共產國家的激進馬克思主義。前者以市場取向為主，透過不同媒體產權及競爭，形成多元資訊及觀點，但也導致娛樂化與商業偏差；後者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至上，透過國有產權的安排及國家控制，致使媒體服膺黨國利益與指導，並強化社會秩序。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度指數排名，在評比的 180 個國家中，中國排名向來與北韓、越南等亞洲威權國家相當，2023 年排名第 179 名，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新聞媒體及記者的自由空間日減（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3）。誠然，中共威權政體要求媒體高度服從黨國，不以新聞自由為優先價值。傳播媒介被定位是集體的鼓勵者、宣傳者，以及建設共產主義的教育者。首先，媒體是為黨國服務、為黨國擁有的宣傳工具（王毓莉，1999）；並在資本作用下，從洗腦工具化身為「黨的公關公司」，媒體任務是宣揚黨國正面形象，淡化不協調的聲音（He, 2000）。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依據毛澤東思想打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一方面以《新華社》、《人民日報》為主建立黨媒喉舌，一方面管控《文匯報》、《大公報》等民主派媒體，使其必須遵從黨國指令。在意識形態建構上，媒體一方面推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另方面則批判資本主義以及美帝

霸權。1978年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後，新聞管制經歷寬鬆時期，並逐步放寬允許民間資本介入，但對新聞內容的管控仍透過法規、指導、處罰等方式恩威並濟（何清漣，2006）。

改革開放後的媒體市場結構，產生了競爭的態勢。以市場層級而言，形成全國性市場、區域性市場和地方性市場；以市場化程度而言，分成準市場化報紙，如各級黨報，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如晚報和都市報（宋建武等人，2015）。中國報業市場中的黨報，肩負社會效益目標，必須配合政策宣導，內容偏向政治化與枯燥無味；至於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則貼近群眾生活，吸引民眾自費訂報（王毓莉，2010）。

然而，自由多元主義所預期的市場化與媒介多元的關係，並未在中國實現（戴瑜慧，2019）。中國政府控制下發展市場機能，出現三種特色：新聞自由仍居世界之末；商業化媒體在黨國與市場之間搖擺不定；放棄鼓吹政治改革，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整體而言，黨國控制的市場化媒體面臨巨大限制，為了爭取閱聽人而在新聞風格及市場策略上推陳出新，但在政治上則避免踩到意識形態地雷（李金銓，2004）。

另一方面，網路科技帶來言論自由的許諾，在中國也是一大疑問。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推動新聞業的發展、新聞媒體開始向網際網路進軍，傳播內容和對象也隨之改變；新興網路媒體影響力日增，也促成民間思潮壯大，形成與國家話語權相對獨立的個人言論空間。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仍不斷透過強制性的國家權力，對媒體乃至網路空間進行管制，「政治正確」的限制與需要，使官方話語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何清漣，2006）。

整體而言，中國政府將管理傳統媒體的方式延續到網路空間。習近平「新時代」下對傳播內容以防火長城、金盾工程、綠壩網路過濾軟體和網路員警等措施進行治理和干預，建構出嚴密且有效的網路內容防火牆，形成科技威權主義（王信賢，2018）。由於網路新聞和言論涉及中共政權穩定性，因此經濟發展也未能阻擋政府的嚴密控制，如法輪功事件，官方對新聞報導採取一致定調，並有高達三萬名網路警察在其中巡邏，即時刪除、屏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及內容（何舟，2008；高韻，2014；Zhao, 2008）。

習近平任內強調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領導的雙軌並進，十八大以後積極強化新聞輿論。2016年2月19日在北京主持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中國共產黨新聞

網，2016 年 2 月 20 日）；習近平要求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導向。因此不管新舊媒體、各類型內容，「國內新聞報導要講導向，國際新聞報導也要講導向」，以達成「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同上引）。

中國政府高度控管媒體，使得它主動、被動配合國家政策，對於攸關重大國家利益的議題，不敢越雷池一步。共產黨建國以降，歷經冷戰以至於全球化變局，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向外對抗、向內整合的主要意識形態，更是在媒體的各式報導中表露無遺，並進一步動員人民加入民族主義的集體陣營。

李金銓（2002）指出，冷戰後的中國傳播媒介處於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的拉扯之中，共存且競爭的關係不斷影響著中國的媒介生態和意識形態塑造。他認為，民族主義多半是由國家政權所界定，而中國政府透過兜售民族主義，聚焦「他者」以淡化國家內部的不滿情緒，利用與外來勢力（臺海關係、美中關係）的對抗，塑造一致對外的民族情緒，並經由媒體製造反美、反西方的話語浪潮，以此展示中國強烈的民族自豪和國家認同，並從中迎合資本市場需求，獲取利潤。因此，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反美思潮，雖始於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卻在市場化之後變本加厲。市場化媒體在利之所趨之下，主動成為民族主義的啦啦隊。

汪宏倫（2014）從制度和情感結構、認識框架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發現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認同，由於過去被西方欺凌的歷史悲情，與國際秩序不公的現實悲情間相互作用，進而在當今轉化為「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對外基本一致，支持一個強大的國家或政府，輸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爭之框」。中國的普通公民被廣泛地涉入、動員到此框架之中，透過對外建立主體意識，對內鞏固政權來區分敵我，形成國民全體理解和詮釋戰爭的統一認知框架；其間，傳播媒介至關重要。

習主政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為召喚，多使用歷史傷痛來體現中國國家發展的得之不易，進而追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施正鋒，2016）。並在此基礎上談及中國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年 7 月 17 日）。可見，習近平執政方針仍以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維護國家統一，作為對內維穩的基礎，對外形成統一戰線的框架。

近年來中國崛起，帶動新一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1980 年代

鄧小平南巡帶動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並成為世界工廠，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高度整合進全球經濟體系。美國等西方世界抱持樂觀全球化思維，與中國積極進行經貿往來，一方面獲取自身經濟利益，一方面也認為中國經濟成長將帶來政治民主化。然而，中國成為經濟和軍事大國的同時，對內強化政治領導威權，與美國從合作轉化成軍事及經貿的競爭關係，區域政治的風險不斷攀升。

習近平在 2012 年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從貧窮走向富強的光明遠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9 月 1 日）。

伴隨中國夢的民族主義，即是動員中華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美貿易戰白熱化之際，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發展壯大面臨的一個重大威脅：美國」（Bradsher，2023 年 3 月 8 日），因為：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同上引）

西方媒體認為，這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喜聞樂見的。綜合上述，在美中戰略競爭下，中國的新聞報導以黨國絕對領導為政策核心，塑造中國形象和話語權，並在處理對外關係，尤其是美中關係時，強化恐美、仇美的情緒，形成意識形態分割（李金銓，2002；汪宏倫，2014）。

二、戰爭新聞報導與媒體角色

綜觀媒體與戰爭研究，主要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分析媒體與國家的關係，是否存在官方消息來源依賴，並進一步分析媒體再現戰爭的主題和框架。

首先，就媒體角色而言，媒體可能促成國際社會的交流和了解，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Fortner, 1993）；但在戰爭之際，傳播也可能帶來衝突和暴亂。胡光夏（2007）分析認為，戰爭爆發前，媒體角色多樣、載舟

覆舟，媒體可能是和平談判的催化劑，也可能是和平的破壞者及戰爭的煽動者，甚至是發動戰爭的輿論塑造工具。

對於衝突發生時的媒體角色，Thussu & Freedman (2003) 分為主要三種：批判戰爭的觀察者 (critical observer)、宣傳者或公關人員 (publicist)、戰場 (battleground) 或決策執行的場域。他們認為，媒體本身便是現代衝突的手段與工具，二者已密不可分。胡光夏 (2007) 綜合相關觀點，將媒體之角色分為六種：戰爭的批評者、戰爭的啦啦隊、鼓勵他國參加戰爭、情報蒐集與決策之參考來源、戰爭工具、戰爭平臺。

由於戰爭涉及國際間的武力衝突，攸關交戰雙方的國家利益及國際社會秩序，因此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勢必涉及戰爭議題中的媒體與國家關係。以 Chomsky (2002) 為首的批判學者提出宣傳模式，認為新聞媒體是政府的喉舌，即使高度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戰爭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是複製領導者政經框架的啦啦隊 (Herman & Chomsky, 1988 / 沈聿德譯, 2021; Chomsky, 同上引)。也有主張媒體在戰爭中是中立角色的理論，認為新聞不全然會成為政府操縱民意的工具，媒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導，但不能作為政客的替罪羔羊 (Berry, 1990)。

Nimmo & Combs (1980) 指出，媒體不可能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如同 Lasswell (1927) 所言，媒體是政府戰爭宣傳 (propaganda) 的工具，透過操縱符號控制輿論，達成影響他人思想和態度的目的。Knight (2003) 也指出，有關戰爭的事實，會因政府的政治意志介入和干擾而被扭曲，記者在獲得真實和全面資訊的過程變得困難重重，使得媒體在戰爭新聞中的角色無法中立客觀。

國家利益進一步左右媒體的消息來源與報導框架。McChesney (2004 / 羅世宏等人譯, 2005) 指出，美國專業新聞學中過度依賴官方或專家作為正當新聞的消息來源，導致戰爭新聞會因官方消息來源的影響，而呈現較為符合國家意識形態之報導框架。因專家也幾乎取自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和政府官員、公眾人物一樣，其言論存在強烈的主流偏見，導致政府透過媒體設定報導的議題及框架，尤其在涉及外交或軍事行動時格外頻繁。

Dimitrova (2001) 研究 CNN 對於科索沃戰爭的報導，指出 CNN 主要透過外交政策、軍事行動、難民災難、證據四種敘事框架，描述戰爭中的暴行。報導內容傾向表明美國政府採取行為之正當性；其消息來源大都取自美國國內的二手證據，而非來自戰爭所在地區的一手資料。Dimitrova &

Strömbäck (2005) 對比美國《紐約時報》與瑞典的 Dagens Nyheter,¹ 發現美國報紙大量依賴官方或軍方的消息來源，並較多採用軍事衝突的報導框架，而瑞典報紙則較多使用責任擔當與反戰抗議的框架。

有關兩次波斯灣戰爭之相關研究，研究者比較不同國家之媒體在報導同一衝突事件時所採取的框架，研究結果大同小異，不同國家會對相同事件採取不同的報導框架。大眾媒體透過選擇和排除社會真實中的內容，進而建構符合自身框架的故事 (Pan & Kosicki, 1993)。Topoushian (2002) 將兩家阿拉伯報紙和兩家北美的報紙有關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進行框架分析，透過微觀和宏觀層面比較，結果發現不同國家對於戰爭的詮釋有所不同，其政治立場經由報導框架體現在報紙上，反映各國的歷史文化和戰爭中的政治利益、外交策略等。

戰爭新聞的相關研究，更進一步檢視媒體如何再現戰爭與衝突。在報導主題上，戰爭新聞傾向於戲劇化、情緒化與衝突化。Hallin & Gitlin (1993) 研究波灣戰爭的電視新聞報導中戲劇化的成分，發現戰爭新聞相較於其他政治事件報導有更多的情感參與，其中有許多與戰爭相關的參與性之政治活動，戰爭已不再是簡單的新聞事件。Wolfsfeld (2004) 同樣認為，媒體在報導戰爭新聞時，慣用的運作模式是報導緊張、衝突和暴力，包含更多情緒化甚至狹隘的內容，反而沒有發揮促進和平的角色。

諸多研究採取框架分析，探討戰爭新聞的再現，並關切衝突與和平框架的使用。Neuman et al. (1992) 稱戰爭的新聞框架為兩極化勢力的拉扯，是全世界爭奪政治影響力的方式，同時也是吸引讀者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因為衝突事件對於新聞守門人而言是最具新聞價值之一的報導類型。他們分析美國新聞報導中常用框架類型，如經濟框架、衝突框架、無能為力框架 (powerlessness frame)、人類影響框架 (human impact frame)、道德框架等，並發現美國媒體在報導個人、團體、組織間的分歧時，普遍優先使用衝突框架。

但也有反證指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美國媒體報導強調自我美化 (self-glorification) 的框架，對於戰爭以團結、榮耀、驕傲的姿態進行報導，儘可能避免有關傷亡、破壞等新聞，並對國內有異議的輿論或政客污名化及指控 (Kelman, 1995)。An & Gower (2009) 及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

1 本刊編者註：此為 1864 年 12 月 23 日發行於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報紙，一般中譯為《每日新聞報》；其言論立場經歷人員變動與版權變更有多次更迭，在 20 世紀 60 年代，發行量為瑞典日報中首位，21 世紀初發行量約為三十六萬餘份。

針對媒體報導危機新聞進行研究，發現媒體組織在報導危機議題時所採取的框架類型，其優先順序為：責任歸屬、經濟後果、衝突、人類利益、道德。

整體而言，Galtung（2000, 2003）針對戰爭新聞提出和平新聞框架和戰爭新聞框架，即指兩種相反的報導戰爭之模式，他將與戰爭相關的新聞分為四種取向的框架：一、和平／衝突和戰爭／暴力，前者關注衝突的形成，後者更聚焦在戰場上；二、真相和宣傳；三、人民和菁英；四、解決方案（solution）和勝利（victory）。他認為戰爭新聞應更傾向於和平新聞的報導框架，而不是過度報導暴力和利用戰爭作為政府宣傳的武器。

關於衝突與人道立場的報導趨勢，近年研究也得出不同的觀察。Schwalbe & Dougherty（2015）以戰爭視覺化報導為切入點，針對美國三本雜誌有關黎巴嫩戰爭的報導進行視覺框架分析，發現大部分內容集中在軍事衝突框架上，不過隨著衝突的發展，有關人類利益框架的報導逐漸增加。

Aday（2010）探討美國兩家媒體對伊拉克戰爭報導框架的轉變。研究發現，因新聞內容過度反映參戰國的負面訊息而造成民眾的反彈，人們開始對政府行為感到不滿，反戰菁英形成的反框架（counterframe）勢力，挑戰過去白宮對戰爭議題的權威報導框架。Luther & Miller（2005）則聚焦於美伊戰爭的示威運動，對比兩類黨派的報導框架，研究指出，美國媒體在支持或反戰的兩類立場中，傾向於報導反戰團體的意見。上述研究，證明美伊戰爭中存在所謂反框架之報導。

綜合前述文獻，媒體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多元，可能是中立的批判者，也可能是鼓吹的啦啦隊，甚至是戰爭工具。多數情況下，媒體再現戰爭受到國家利益的影響，也傾向於受官方消息來源左右。不論居於主動或是被動，媒體扮演複製國家利益與政經啦啦隊的角色鮮明。細究戰爭報導的框架，在衝突與和平的兩端，媒體經常重現衝突場景；而在經濟框架、責任框架、影響框架、道德框架等議題的複雜牽動下，可能也會出現人道與反戰的立場。

參、研究方法

依據文獻回顧結果，本文認為中國媒體政策經歷不同時期的演變，形成黨國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兩種類型，在報導取材與市場需求上，發展出不同風格；但在意識形態及媒體角色上，則受到黨國控制並服膺社會主義與國家利益。尤其戰爭與國際議題的報導，往往與國家利益高度相關，因此不同類型

媒體呈現的報導立場空間或許有限。探討兩種類型媒體對於俄烏戰爭報導的異同，有助於理解當前中國媒體的角色與樣貌。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動機起源於對於俄烏戰爭的關切，以及對中國媒體管制以及媒體角色的好奇，回顧上述文獻之後，形成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 (一) 黨營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如何報導俄烏戰爭？進一步的問題為：有關俄烏戰爭之新聞的報導形式與報導主題為何？引用哪些消息來源？呈現哪些報導框架？採取何種立場？兩家媒體間是否存在差異？
- (二) 兩類媒體所使用的框架包裹有何異同？進一步的問題為：所使用的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為何？反映了何種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整體而言，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報導中所扮演的媒體角色為何？

二、資料蒐集與取樣

本研究選取「人民網」(people.cn)、「澎湃網」(thepaper.cn)² 兩家網路媒體，分別代表黨營喉舌媒體、黨營商辦媒體。

《人民網》發源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為傳統媒體背景的衍生網站，並且作為八大國家級重點新聞網站，其影響力和權威性不可小覷，許多特定議題都需要透過該網頁的報導，才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曾繁旭，2009）。因此，他可作為中共官媒政治論述的重要研究指標，其有關俄烏戰爭之相關報導，即反映中國政府對於這場戰爭的建構模式與立場態度。

《澎湃新聞》（或稱《澎湃》）係官辦的國資新媒體項目（綜合新聞網站），隸屬於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的上海報業集團，其內部結構和人員組成已實現從傳統官方紙媒到媒體融合後的採編、管理新模式之轉型（陳昌鳳，2015），因此可將《澎湃新聞》基本定義為隸屬官方的商業媒體。分析指出，《澎湃》新聞傾向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2 本刊編輯註：《澎湃新聞》，是一家中國綜合新聞網站，以「澎湃新聞 -The Paper 簡」自我標示，本處考量本研究案例兩個網站的一致性，故以填入網頁搜尋的小寫網址為主，特此說明。

擺脫行政命令的報導形式，實現新聞產業化之特點，重視閱聽人需求（趙子忠、崔卓宇，2014）。因此本文假設，《澎湃新聞》的媒體定位、報導風格和取向均有別於純官媒性質的《人民網》，可以做為參照。

本研究以俄烏戰爭為特定事件，透過內容分析與新聞框架分析，根據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框架、立場方向五個層面，結合任教於魯汶天主教大學的比利時學者 van Gorp (2007) 框架包裹的方式，兼具質化、量化過程，包含歸納和推理兩個階段，觀察中國官方媒體《人民網》，與隸屬官方的商業媒體《澎湃新聞》如何建構他國的戰爭——俄烏衝突，並討論背後的文化現象。

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22）發布的《2021 中國網絡媒體發展報告》，網路媒體排行以官媒《人民網》居榜首，市場導向的《澎湃新聞》位居第五。報告指出，中國的網路媒體以官媒佔據主流權威優勢，並引導商業媒體共同打造以愛國情懷、家國一體及人文關懷為主的網路媒體氛圍。

本研究聚焦於網路上的新聞內容和言論，因此網路新聞網站選擇《人民網》、《澎湃新聞》，其中後者為聚合平臺，有大量用戶生產之內容，本研究僅針對媒體組織編採的原創內容進行分析。因此有關《澎湃新聞》的數據蒐集，選取內文標注「來源：澎湃新聞」之報導。

由於俄烏戰爭相關新聞數量龐大，以及戰事仍在進行中，無法全面涵蓋，研究者根據重要戰事發生時間，選擇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作為時間範圍，使用《人民網》和《澎湃新聞》網站的內建搜尋引擎，以關鍵字「俄烏衝突」進行搜索，對兩個網站之抽樣，排除重複樣本，並根據以下篩選標準進行新聞樣本抽取：

- （一）排除未將俄烏戰爭作為論述主體之相關新聞；
- （二）排除影音新聞、多媒體新聞、查證類型的文章；
- （三）排除週期性的新聞大事記。

根據上述篩選原則，本研究蒐集到《人民網》181 則，《澎湃新聞》380 則，共計 561 則新聞報導。

三、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的類目建構必須要根據研究問題使用最適當的方法，最常用的便是依據理論、過往研究結果進行類目建構，另一種則是由研究者自行建構（楊國樞等編，1989）。研究者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發展適用於本研究之類目，分析單位為「則」，以一則新聞或一則文章作為基本的單位進行歸類，新聞內容方面，主要根據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框架、立場方向進行整理。

本研究類目建構，包括以下項目：

（一）報導形式

1. 純淨新聞：一般新聞報導，只陳述客觀事實，不加以任何評論成分。
2. 專題、深度報導：新聞記者針對俄烏戰爭事件所撰寫的深度剖析之報導、調查，較不受時效性限制。
3. 評論、社論：評論性報導或文章，針對俄烏戰事發表評論、看法，存在一定立場或意見態度，通常由媒體工作者或專家學者撰寫。
4. 外電：來自國外的報導，通常為翻譯國際通訊社的內容。
5. 微信自媒體公眾號推文：多為代表作者個人立場的評述類文章。

（二）報導消息來源（選擇單一消息來源，以佔據較大篇幅的內容為主要依據）

1. 中國消息來源

- （1）官方：政府機構、人士或新聞媒體；
- （2）非官方之人士：學者、專家；
- （3）一般民眾。

2. 國外消息來源

- （1）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 （2）烏克蘭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 （3）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 (4) 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委員會等；
- (5) 外國一般民眾。

3. 無消息來源（新聞媒體自身觀點、評論類報導，如人民日報的國際評論欄目「鐘聲」、報內評論員等）

（三）新聞的報導主題

- 1. 戰事相關情況，如戰爭現場、戰爭行為等；
- 2. 俄烏兩國談判；
- 3. 戰爭造成的經濟影響；
- 4. 戰爭造成的人權問題；
- 5. 戰爭對世界格局造成的影響；
- 6. 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行為；
- 7. 參戰國一般公民的態度、行為；
- 8. 其他。

（四）新聞的報導框架

參考 Neuman et al. (1992)、Galtung (2000, 2003) 等研究，以及俄烏戰爭的特性，本研究將報導框架區分為以下四種，並以每則新聞的主要內容作為判斷依據：

- 1. 衝突框架：涉及到因戰爭引發的區域、國家、組織間的分歧、對抗、軍事行動，雙邊或多邊關係的問題。
- 2. 責任歸屬框架：包含以下四個次框架
 - (1) 俄羅斯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 (2) 烏克蘭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 (3) 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 (4) 中國在戰爭中的自我美化。
- 3. 經濟影響框架：包含以下三個次框架

- (1) 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
- (2) 對俄羅斯經濟影響；
- (3) 對烏克蘭經濟影響。
4. 道德框架：反對戰爭的抗議行為，或涉及公平、正義、公共利益、人權等問題。

(五) 新聞報導的立場方向；

按照研究所需，將立場方向類目闡釋為兩家媒體的報導內容對參戰國所呈現的立場，包括：

1. 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2. 對烏克蘭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3. 中性，主要為對參戰國沒有明顯立場，或平衡報導的新聞。

建構完內容分析編碼表之後，抽取 10%-25% 的樣本進行信度分析 (Wimmer & Dominick, 1991)。本研究在 586 則樣本中隨機抽樣選取 63 則進行前測，由兩位新聞傳播研究生進行編碼，依照 Holsti (1969) 的信度公式計算：

1. 相互同意度 = $2M / (N1 + N2)$ ；
 2. M = 編碼員結果一致性的項目個數；
 3. $N1$ 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4. $N2$ 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5. 信度係數 = $(N \times (\text{平均相互同意度})) / (1 + [(N-1) \times \text{平均相互同意度}])$
- N 為編碼員總數。

經計算，本研究前測結果總體信度為 93%，各項介於 0.89-0.95 之間，均高於 0.8 信度係數標準。

四、 框架包裹法

媒體對於事件的陳述可以左右公眾輿論，戰爭新聞的報導框架尤為重要 (Neuman et al., 1992)，無論是符合政府或是挑戰權威的框架，都體現媒體對於戰爭的詮釋和立場。而在實際對新聞文本進行框架分析時，應發現研究對象明確且明顯的框架裝置，了解其講述事件的大致方向，在此基礎上再考察其隱含框架，最後則是不同框架的分佈狀況 (李子甜、徐美苓，2020)。

本研究依循過往對於框架包裹和框架矩陣的研究取徑 (潘忠黨，2006；van Gorp, 2007)，透過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對樣本進行拆解和分析，以框架矩陣的表格化形式呈現，並針對部分報導進行潛在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

框架包裹主要有三個層面：首先觀察新聞文本中用字的選擇、譬喻、例證等框架化裝置內容；其次根據問題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估、解決建議四類取徑歸納新聞的推理裝置；最後分析新聞報導背後是否蘊含文化背景現象，其反映的意識形態為何。

研究歸納出四大類俄烏戰爭的新聞框架：「衝突框架」、「責任歸屬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其中「責任歸屬框架」和「經濟影響框架」包含若干個次框架；以框架包裹的分析方法對篩選後的樣本進行剖析，根據框架化裝置和推理裝置，推導新聞報導背後蘊含的社會文化現象，並檢視中國媒體在建構俄烏戰爭時，是否服膺政府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媒體角色。

肆、 研究發現

一、 內容分析

本節從量化的角度，呈現並分析兩類媒體在俄烏戰爭的新聞／文章之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內容主題、內容框架、立場方向的分配情況。

表 1 的結果可看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報導俄烏戰爭新聞時，均以「純淨新聞」的報導方式為主（分別占 76.2% 和 84.2%）。兩家媒體在報導形式上存在顯著差異 ($X^2=23.279$, *** $p < .001$)。

《澎湃新聞》相對《人民網》會採用「專題、深度報導」的形式呈現新聞（分別占 4.7% 和 0.0%），而《人民網》「評論」類的報導比例要遠高於《澎湃新聞》（分別占 22.1% 和 9.7%），二者採取外電的比例都低。

表 1：《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報導形式分配

報導形式	人民網	澎湃新聞
純淨新聞	138 (76.2%)	320 (84.2%)
專題、深度報導	0 (0.0%)	18 (4.7%)
評論	40 (22.1%)	37 (9.7%)
外電	3 (1.7%)	5 (1.4%)
總和	181 (100.0%)	380 (100.0%)

$\chi^2=23.279$, ***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 2 可看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消息來源的引用上存在顯著差異 ($\chi^2=34.202$, *** $p < .001$)。前者有關俄烏戰爭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為「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4.3%)，其次為「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3.7%)，兩者比例相去不遠；《澎湃新聞》則高度引用「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30.0%)，其次才是「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1.6%)。若比較俄羅斯及烏克蘭的消息來源比例，《人民網》相對偏重俄羅斯消息來源，卻只給烏克蘭消息來源不到 10% 的比例；《澎湃新聞》給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消息來源比重較為平衡（分別佔 21.6% 和 18.2%）。以中國消息來源的使用，《人民網》引用的比例高於《澎湃新聞》不少（分別佔 12.7% 和 5.5%）。

表 2：《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消息來源分配

消息來源	人民網	澎湃新聞
中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或新聞媒體	23 (12.7%)	21 (5.5%)
中國非官方人士	4 (2.2%)	9 (2.4%)
中國一般民眾	1 (0.6%)	0 (0.0%)
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4 (24.3%)	82 (21.6%)
烏克蘭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17 (9.4%)	69 (18.2%)
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3 (23.7%)	114 (30.0%)
國際組織	19 (10.5%)	51 (13.4%)
外國一般民眾	1 (0.6%)	10 (2.6%)
無消息來源	29 (16.0%)	24 (6.3%)
總和	181 (100.0%)	380 (100%)

$\chi^2=34.202$, ***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總體而言，可看出《人民網》依循官方消息來源依賴、偏好俄羅斯消息來源的傾向明顯；《澎湃新聞》取用交戰兩國雙方的消息來源則較為平衡，且較少使用中國官方消息。一方面，數據顯示出官媒與商業化媒體在消息來源使用上的差別；但兩者同時都極少以一般民眾作為消息來源。

表 3：《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報導主題分配

報導主題	人民網	澎湃新聞
戰爭情況	23 (12.7%)	101 (26.6%)
俄烏兩國談判	22 (12.1%)	21 (5.5%)
經濟影響	29 (16.0%)	54 (14.2%)
人權問題	1 (0.6%)	10 (2.6%)
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5 (2.8%)	14 (3.7%)
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及行為	97 (53.6%)	158 (41.6%)
參戰國公民態度	0 (0.0%)	10 (2.6%)
其他	4 (2.2%)	12 (3.2%)
總和	181 (100.0%)	380 (100.0%)

$\chi^2=30.025$, ***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表 3 的報導主題分配上，結果顯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報導主題上仍存在顯著差異 ($\chi^2=30.025$, *** $p < .001$)。與過往研究較為不同的是，兩家媒體重視「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及行為」，佔比最高（分別為 53.6%、41.6%），前者主題排序分別為「經濟影響」（16.0%）和「戰爭情況」（12.7%），其次是「俄烏兩國談判」（12.1%）；《澎湃新聞》主題排序則為「戰爭情況」（26.6%）、「經濟影響」（14.2%）及「俄烏兩國談判」（5.5%）。後者用少數篇幅呈現「參戰國公民態度」（2.6%）、「人權問題」（2.6%），但《人民網》在此兩類主題上幾乎付之闕如。

表 4 結果顯示，兩造有關俄烏戰爭的內容框架存在顯著差異 ($\chi^2=55.388$, *** $p < .001$)。兩家媒體均常使用「衝突框架」，而且商業化的《澎湃新聞》使用比例 (59.5%) 高出《人民網》甚多 (40.9%)。採用「衝突框架」不僅強調戰爭行為本身，同時含括國家／區域／組織的衝突、多邊問題等，因此在戰爭新聞中屬於最常被使用的報導框架。

除「衝突框架」外，《人民網》也高度使用「責任歸屬框架」（32.0%），尤其偏重「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26.0%），雖然《澎湃新聞》「責

任歸屬框架」的比例（9.7%）遠低於《人民網》，但其中「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仍在此主框架下占較高比例（7.6%）。二者均較少將戰爭責任歸屬至參戰國任何一方，反而強調美國或北約在此衝突中的責任，如在報導中直指美國是戰爭的始作俑者；或是在「責任歸屬框架」下，使用「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呈現中國面對此戰爭時負責任、有擔當的態度。

表 4：《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內容框架分配

內容框架	人民網	澎湃新聞
衝突框架	74 (40.9%)	226 (59.5%)
責任歸屬框架	58 (32.0%)	37 (9.7%)
-- 俄羅斯負責	2 (1.1%)	3 (0.8%)
-- 烏克蘭負責	0 (0.0%)	1 (0.3%)
-- 美國 / 北約負責	47 (26.0%)	29 (7.6%)
-- 中國自我美化	9 (5.0%)	4 (1.0%)
經濟影響框架	33 (18.2%)	78 (20.5%)
-- 對國際、非參戰國	25 (13.8%)	40 (10.5%)
-- 對俄羅斯	8 (4.4%)	26 (6.8%)
-- 對烏克蘭	0 (0.0%)	12 (3.2%)
道德框架	16 (8.8%)	39 (10.3%)
總和	181 (100.0%)	380 (100.0%)

$\chi^2=55.388, ***p <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相對於責任歸屬，市場化媒體更重視「經濟影響框架」，為佔比第二高的主框架（20.5%），與《人民網》正好相反；在經濟影響主框架下，《人民網》和《澎湃新聞》同樣以「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為主（分別佔比 13.8% 和 10.5%），內容以討論戰爭對各國經濟的影響為主。

《人民網》與《澎湃新聞》使用「道德框架」的比例差別不大（分別占 8.8% 及 10.3%），主要強調戰爭背後所引發的公共利益、人權問題，如《澎湃新聞》採訪戰爭爆發後各國難民們遭遇的不公平對待。

表 5 為立場方向的分配情況，可看出《人民網》和《澎湃新聞》並無顯著差異（ $X^2=2.717, p > .05$ ），均以中性的平衡報導為主（分別佔 92.8% 及 95.3%），《人民網》較《澎湃新聞》對烏克蘭的同情態度更為積極（分別占 6.6% 和 3.7%），但二者都較少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前述消息來源

分析指出，《人民網》高度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但是並未因此對於俄羅斯採取同情立場。對參戰雙方維持中立立場，不論是商業媒體或官媒並無明顯差異，符合中國媒體管制下對於重要新聞事件「定調」的型態。

表 5：《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立場方向分配

立場方向	人民網	澎湃新聞
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1 (0.6%)	4 (1.0%)
對烏克蘭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12 (6.6%)	14 (3.7%)
中性、無立場	168 (92.8%)	362 (95.3%)
總和	181 (100.0%)	380 (100.0%)

$\chi^2=2.717, p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框架包裹

根據 van Gorp (2007) 的「框架包裹」之研究取徑，本文利用框架矩陣拆解和分析研究樣本，分別從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對新聞文本進行質化歸納。

根據上述的內容框架分析結果，歸納出四大類框架：「衝突框架」、「責任歸屬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其中「責任歸屬框架」和「經濟影響框架」包含若干個次框架。以下將依序對《人民網》和《澎湃新聞》有關俄烏戰爭之新聞文本進行框架矩陣分析，舉例討論兩家媒體在此事件中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與意識形態，以及媒體所扮演之角色。

(一) 衝突框架

前述量化分析結果可知，衝突框架是兩家媒體對於俄烏戰爭新聞中最常使用的報導框架，符合過往戰爭新聞的主流研究結果。該框架內容主要針對俄烏兩國相關議題而引發的區域或組織、國家之間的衝突，同時包括雙邊或多邊問題，在樣本中常見的有：俄烏兩國戰爭的即時情況及戰爭行為、國與國或組織之間因戰爭而變動的關係等。該框架最核心的內容及意涵為，因俄烏兩國的衝突導致利害關係人間的意見分歧、對立，甚至衝突及戰爭行為。

雖衝突背後常涵蓋歸責或對另一方的指責，但這屬於「責任歸屬框架」中，透過報導內容對戰爭行為的責任進行歸屬的部分，不在「衝突框架」的討論範疇之內。

「衝突框架」多出現在純淨新聞報導，其框架裝置分析，首先考量低層次的用字，字彙選擇上通常都與衝突、軍事行為有關，用於描述戰爭情況，常見的用字如下：「特別軍事行動」、「緊張」、「衝突」、「入侵」、「保衛」、「襲擊」、「對峙」、「譴責」、「斡旋」等等。並且，《人民網》及《澎湃新聞》都引述俄羅斯官方說法，將此戰爭行為稱為「特別軍事行動」，如「俄羅斯總統普京 24 日清晨發表電視講話說，決定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黃河等人，2022 年 2 月 24 日）。

其次，衝突框架中常聚焦於事件當事者之間的不同論述，如俄烏兩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針對布查事件各執一詞。《澎湃新聞》喜用此類議題，且在遣詞用字上更加情緒與煽情：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表示，俄羅斯每天都在做出人道主義努力，相反是烏克蘭方面蓄意阻撓。涅邊賈說，烏克蘭的極端分子利用平民作為人盾，卻將他們的遇害歸咎於俄羅斯軍隊。

近日，烏克蘭媒體播出據稱是在基輔市西北部郊區布恰鎮拍攝的視頻，稱俄軍在占領當地期間殺害了數百平民。俄羅斯駁斥烏克蘭方面的指控，稱烏克蘭公布的所謂照片和視頻材料「都是演的」（澎湃新聞，2022 年 4 月 6 日）。

這篇報導同時引述俄、烏雙方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敘事方式，透過用字選擇呈現俄烏互相指責對方所形成的對峙衝突，俄羅斯指出布查事件是烏克蘭「極端分子」所為，並且烏方所提供之證據「都是假的」，俄方不斷為「人道主義」努力，並未如烏方所言「殺害平民」。同時，報導也高度引用俄羅斯駁斥訊息，似有為俄羅斯澄清的傾向。

包括在戰爭爆發初期，有關烏克蘭如何面對俄羅斯進攻的報導中，也可透過用字看出對於戰事以及雙方衝突的敘述，直指烏克蘭與俄羅斯實力懸殊，將烏軍譬喻為「無頭蒼蠅」，面對俄軍的突擊「無招架之力」，僅有「挨打」的份。市場化媒體的敘述方式高度戲劇化，也不看好烏克蘭處境。

這次軍事衝突，俄羅斯發動的網絡戰和電子戰也值得關注……

電子戰同樣重要，干擾對方的雷達、通信，可以讓對方「聽不到、看不見」，像無頭蒼蠅一樣。

對於俄軍的聯合火力突擊，烏軍看起來幾乎是無招架之力，大部分重要軍事目標都被打了，這也正常，俄烏軍事實力差距太大了……加上烏軍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是蘇聯時期的產品，對於俄軍來說再熟悉不過，性能怎麼樣，有什麼缺點，了如指掌，烏軍只有挨打的份了（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5 日 a）。

在框架推理上，「衝突框架」指因俄烏戰事使國際和不同地區的緊張局勢升級（問題定義），主要涉及各方利益所引發的多邊問題、意見不合，甚至衝突，不僅是俄烏兩國的關係，還包括參戰國與各國或國際組織間的關係、中美關係、多邊關係等等（因果解釋）。並有相關報導指出衝突行為（軍援、制裁等）並不利於緩解局勢（道德評估），應儘早停息戰火、和平談判（解決建議）。

在報導模式上，首先是中、東歐國家與美國應對烏克蘭危機的方式實有分歧，或由於制裁俄羅斯的行為，所引發歐洲內部乃至世界之危機，如：

〈歐洲人頻頻穿梭，美國人怒目相向〉

自 2021 年 10 月出現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之間就出現了顯著差異。美國總統拜登明確支持烏克蘭未來加入北約。隨著俄羅斯愈加頻繁地向俄烏邊境調兵遣將，對烏克蘭虎視狼顧，拜登政府和北約架構向烏克蘭提供了真真切切的物資與裝備援助，而不像德國的朔爾茨政府那樣僅僅意思一下，象徵性地提供了幾千頂頭盔……雖然拜登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從未公開批評或貶低歐洲人，但他們不僅堅持對俄羅斯怒目相向，而且對歐洲人的斡旋行動冷眼旁觀，沒有做出任何明確或積極的回應（忻華，2022 年 2 月 25 日）。

上述報導中便談及美國與歐洲在對俄採取制裁時行為的不一致，造成美國對歐洲「斡旋」、「冷眼旁觀」態度的「怒目相向」。

其次是因戰事引發的中、美關係問題，兩造常就對參戰國的立場或行為，產生分歧與對峙，公開指責對方的行為只會加劇危機升級，中方的媒體在此推理裝置中，常描述美方捏造假新聞抹黑中國，如：

趙立堅：「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14 日已經否認俄羅斯曾請求中方提供軍事援助。美方不時製造和傳播虛假信息，既不專業，也不道德，更不負責任。這樣做只會使美國進一步失信於世界。」

美方應該做的，是深刻反思自身在烏克蘭危機發展演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正為推動烏克蘭局勢緩和做些實事……（人民網，2022 年 3 月 15 日）。

上述報導為中國譴責美方相關報導中常見的起手式，以引述俄方消息來源為論述依據，先對美方在俄烏問題中所採取之行為進行批判，並指出美國在其報導中的抹黑，進而帶出中國的立場，體現兩國關係在此衝突中形成的對峙與分歧。

最後是國際組織對俄羅斯的態度及行為，主要描述國際組織採取的措施，形成與俄對峙的情形，如：

歐洲委員會表示，暫停俄方代表權的決定只是臨時措施，各方仍可以通過溝通渠道解決俄烏衝突。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已接近通往不歸路的臨界線。」（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8 日）。

上則新聞引述俄官方論述，俄羅斯對歐洲委員會的行為表示不滿，指出歐洲委員會作為國際組織，不應成為西方制裁俄羅斯的工具，並以「通往不歸路」形容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關係。

透過「衝突框架」呈現潛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現象，最明顯之處便是兩家媒體均引述俄羅斯說法，將此戰爭稱為「特別軍事行動」，顯見中俄兩國的歷史互動及友好關係、加上中國政府對此戰爭的立場，影響中國媒體對於俄羅斯行為的定調，並以官方說法作為新聞來源。

在此主框架下，常涉及多邊關係的議題，因此新聞常將議題延伸至中美關係，呈現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報導模式，進而不斷提出中國呼籲和平的立場。由此可見此框架背後的潛在價值觀，即使官方呈現中立的態度，但仍在報導中引用俄羅斯對自身戰爭行為的定義，凸顯中國在兩邊不得罪的原則上仍親俄的意識形態。

此外，透過此框架的報導模式可知，中國媒體在形塑「衝突框架」時，

不斷強化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立之報導立場，如反對西方軍事援助將造成俄烏衝突升級等角度，進而在國際衝突中形塑中國有擔當的大國形象。建構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社會認知框架，體現中國政府將此事件的闡述與國家利益高度連結，透過兜售一致對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塑造中國社會一致信仰和反美的刻板印象之文化現象。

（二）責任歸屬框架

兩類媒體在使用「責任歸屬框架」時有所差異，這是《人民網》第二常使用的框架，《澎湃新聞》相對較少使用。此框架圍繞在討論此次戰爭，以及戰爭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是由於哪個國家所導致的，或強調在此戰爭下國家的行為承擔了何種責任。可再細分為四個次框架：「俄羅斯負戰爭的主要責任」、「烏克蘭負戰爭的主要責任」、「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中國自我美化」。特別的是，兩家媒體鮮少提出交戰兩國應負的責任，反而將報導或評論重心放在美國與國際社會。因此，以下針對「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中國自我美化」分別進行討論。

1. 「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

「美國負責」次框架主要核心意涵為美國或北約是此次戰爭的始作俑者，在「責任歸屬」主框架下，兩家媒體使用此框架的比例都較高，尤其是《人民網》，使用「美國負責」次框架的比例明顯高於《澎湃新聞》。

在框架化裝置上，包含字彙、譬喻和敘事三個面向。字彙選擇常見的有：「骯髒」、「大國欺負小國」、「危害世界」、「霸權霸凌」、「橫行霸道」、「不擇手段」、「拱火澆油」、「煽風點火」等，在報導中以負面的詞彙指責美國或北約激化俄烏矛盾，是戰爭的始作俑者，並且在戰爭爆發後仍不斷拱火。

譬喻方面常使用污名化的譬喻，如：「吸血鬼」、「偽道士」、「製毒師」、「絕命毒師」、「黑客帝國」、「幕後黑手」、「毒瘤」，例如以下報導：

〈破壞國際秩序的唯一獨尊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

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公道，不要霸道；要合作，不要對

抗。這是國際社會共同願望，但有個別國家不這樣想。烏克蘭危機步步升級直至俄烏衝突爆發，這個國家既是始作俑者，又是推波助瀾者。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長期奉行唯我獨尊的霸權政策，四處煽風點火、製造動亂。為維護霸權，美國不遺餘力拉幫結派搞對抗，一系列做法破壞國際秩序，威脅人類和平，美國霸權成為人類社會最大毒瘤（張遠，2022年4月7日）。

〈漫評美式霸權之三：全世界瘋狂斂財的「吸血鬼」〉

美國不斷挑起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所有人都為此付出了代價，只有控制著美國政客的軍工複合體贏了——他們以他國生靈塗炭換來了自己的盆滿鉢滿。美國是名副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瘋狂斂財的「吸血鬼」（陳籽，2022年4月8日）。

吸血鬼、黑手、毒瘤等名詞都有其原先意涵，但在上述新聞中被挪用至形容美國行為的污名化比喻，對其貼標籤，以黑手譬喻美國是戰爭乃至世界亂局背後的操縱者，以吸血鬼譬喻美國透過發起戰爭斂財的行為，又如〈美國是製造傳播生物病毒和精神病毒的「絕命毒師」〉（唐彥林、李蒙佐，2022年4月13日），其中引用俄羅斯的消息來源說明美國在烏設立生物實驗室，並以影視劇名稱譬喻美國為「絕命毒師」，稱其為「毒瘤」，指責美國在全球製造瘟疫和民族分裂，形成意識形態對立而獲取霸權。並使用例證方式，舉生物實驗室的影像資料、俄軍方公開的病毒檢測等資料作為美國進行軍事生物活動的證據。

其次，兩家媒體均使用敘事、舉例的方式說明美國如何影響各國經濟，攪亂世界格局。

美國大搞金融恐怖主義，肆無忌憚地在全球「薅羊毛」「割韭菜」，加劇了全球貧困和不平等。歷史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經濟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等，背後都有美國金融霸權在作祟……如今，美國通過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等手段，再次野蠻

地把國際金融正常運作的規則變成了其肆意掠奪的工具（人民網，2022 年 4 月 6 日）。

或是舉當下例子說明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制裁俄羅斯系列行為之意涵，並將戰爭責任歸責於美國，如〈海外網評：在美國眼裡，烏克蘭不過是拖垮俄羅斯的炮灰〉（聶舒翼，2022 年 5 月 10 日），其中指出美國與西方形成聯盟共同反俄，並自克里米亞事件後便長期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以烏國苦難換取戰爭。

在推理裝置上，「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意指美國的一系列行為催發了戰爭（問題定義），因美國在其間不僅能夠獲取利益，還能穩定霸權地位（因果解釋），把世界經濟、國計民生武器化、工具化，終將會擾亂世界秩序（道德評估），應該要做和平的穩定器而非衝突的鼓風機（解決建議）。

在此報導框架下，常出現「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系列報導，及此類型的寫作模式，主要強調美國攪亂世界格局，推進北約東擴、同時策動烏克蘭發起顏色革命，是這場戰爭的幕後黑手，以此為論點論述數篇有關美國在此衝突背後的所作所為，指出美國應對戰爭負責，從以下一系列標題中便可看出此範例的框架類型：〈挑動俄烏衝突的煽風點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一〉（張遠，2022 年 4 月 7 日）、〈破壞國際秩序的唯一獨尊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劉健，2022 年 4 月 8 日）、〈不擇手段斂財的趁火打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三〉（吳寶澍，2022 年 4 月 8 日）、〈揮舞制裁大棒的橫行霸道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四〉（吳寶澍，2022 年 4 月 10 日）、〈秘密軍事生物活動的幕後操縱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五〉（朱瑞卿，2022 年 4 月 11 日）、〈劣跡斑斑的人權「偽道士」——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六〉（朱瑞卿，2022 年 4 月 12 日），均是透過論述和列舉美國的行為，形成將戰爭責任歸屬於美國的報導框架。

換句話說，中國在面對俄烏戰爭議題時，若涉及美國或北約方面，必將連結美中的對峙關係，媒體在其間透過報導構建意識形態對立，將現有的戰爭歸責於美國，高度呈現抗美、仇美的情緒，甚至連帶舉證過往事件，如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將美國形塑為攪亂世界格局、「毒瘤」之形象，建立中國國民對兩國關係的整體理解、詮釋俄烏戰爭的一致認知框架，達到媒體報導和政府言論管控目的，高度符合大國對峙下，中國政府透過媒體製造

反美的話語浪潮，呈現反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框架。

常見報導類型，如《人民網》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系列報導，以及量化結果均可得知，無論是官方媒體論述，或是商業媒體的評論性文章，包括過往文獻都指明，與反美情緒相關的報導架構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媒體塑造的意識形態分割，已然成為中國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

2. 「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

「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主要意指中國官方在面對戰爭議題時，表現出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形象，核心意涵在於中國面對戰爭、衝突或多邊關係問題時呼籲和平，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的形象。《人民網》作為官方媒體，相較《澎湃新聞》更常使用此框架。

其間消息來源多以中國政府官方為主，因此在框架化裝置中的字彙選擇上，多數使用褒義辭彙，如：「負責任大國」、「勸和促談」、「維護和平」、「平等對話」、「客觀公正」、「光明磊落」、「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等，以表示中國的大國擔當和自我美化，或回擊美國指控。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上負責任大國，中國將繼續發出聲音、提出倡議、採取行動、付出努力。中方願與各方保持溝通、止戰促和，切實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李志偉，2022年3月16日）。

趙立堅表示，我們已經多次就烏克蘭問題闡述中方的立場。老實說，中方的立場的確同少數國家的立場不一樣。中國的立場光明磊落、公正客觀，無可非議。真正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些自以為贏得冷戰，可以獨霸天下的國家；是那些無視他國關切、持續五輪推進北約東擴的國家；是那些四處對外發動戰爭，卻又指責別國好戰的國家；是那些我聽說對俄羅斯的貓、俄羅斯的狗、俄羅斯的樹都要制裁的國家（于瀟清、劉棟，2022年3月17日）。

從上述新聞的報導字彙可以知道，中國不僅在責任歸屬方面美化自身國際形象，表現中方在俄烏戰事上有責任、有擔當的態度，同時回應他國指控，甚至將矛盾指向美方。

框架推理部分，「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意指中國面對烏克蘭問題時，彰顯有責任、公正客觀的立場與態度（問題定義），與少數國家不同，中國不會破壞國際秩序（道德評估），並且由於各國應休戚與共、相互關聯（因果闡釋），因此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將會繼續採取行動，維護世界和平（解決建議）。

此框架的潛在現象與上一框架存在雷同，中國政府在面對俄烏戰爭之中方立場時，常將西方國家劃分為「他者」，以此「一捧一踩」地區分敵我，透過反對霸權主義、宣揚愛國主義展示中國的大國擔當與強大民族自信，進而塑造中國形象和話語權。媒體在其間作為政府意識形態的啦啦隊，以黨的領導作為傳播的核心價值，兜售民族主義以淡化中國內部不滿情緒，假借國際事件、對外關係議題，在新聞報導中塑造一致對外的反美情緒，達到對內維穩，對外形成統一戰線的目的。此為中國宣揚社會統一信仰，輸出中國價值觀的常見方式。

（三）經濟影響框架

「經濟影響框架」是兩家媒體在報導俄烏戰事新聞時較常使用的框架之一，其中《澎湃新聞》相較《人民網》在數量佔比上略高。此框架的主要描述內容為俄烏戰爭導致的經濟影響，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對國際或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對交戰雙方的經濟影響，並以此分為三個次框架：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對俄羅斯的、對烏克蘭的經濟影響等。

1. 「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

首先是「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最為常見，因為影響層面深遠，且互有關連，其框架化裝置主要為字彙和例證，字彙選擇上常涉及金融相關詞彙，如：「跳水」、「跌幅」、「瘋漲」、「經濟制裁」、「滯脹」、「通脹」、「物價飆升」等，主要以負面詞彙形容俄烏衝突對國際金融、全球市場造成的影響，包括引發一系列能源、糧食等危機。

世界貿易組織 12 日發布的全球貿易年度預測報告認為，俄烏衝突危及本就脆弱的全球貿易復甦……報告認為，2022 年獨聯體

地區（不包括烏克蘭）的產出預計將大幅下降 7.9%，該地區的進口將萎縮 12.0%（澎湃新聞，2022 年 4 月 12 日）。

舉相關金融組織或股市的大盤數據，以實際報告及數字說明戰爭對國際經濟造成的直接影響，其間明確點出俄烏衝突波及全球貿易，甚至導致全球食品價格飛漲，如〈糧農組織：3 月全球食品價格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創新高〉（賀飛，2022 年 4 月 9 日），標題便指出戰爭對於國際糧農的影響。

在推理裝置上，該框架指出俄烏衝突導致各國乃至全球的經濟受到波動和影響（問題定義），由於俄烏兩國作為食品、能源等基本商品的主要供應商（因果解釋），而停止貿易或制裁行為將會對低收入國家造成更大影響（道德評估），因此各國政府和多邊組織應共同努力促進貿易（解決建議）。

2. 「對俄羅斯經濟影響」次框架

其次為「對俄羅斯經濟影響」次框架，其核心意涵為戰爭對俄羅斯經濟造成的影響。在此框架下的消息來源，以他國或國際組織和俄羅斯官方為主，報導內容大多談及國際間對俄羅斯的制裁行為，同樣也有新聞引述俄羅斯對於自身經濟波動的闡述。

在框架化裝置上使用字彙和例證，字彙上多屬於經濟層面，如：「收入減少」、「出口暴跌」、「通脹飆升」、「經濟制裁」、「盧布堅挺」、「西方團結」等，但在報導處理上與上一個框架有所不同，如：

俄羅斯央行官網當天發表聲明說，俄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仍然充滿挑戰，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金融穩定風險仍然存在，但在俄政府採取控制資本流動等措施後，其上升態勢目前得到遏制……俄方隨即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將基準利率從 9.5% 大幅上調至 20%，以應對西方制裁、穩定金融市場、提振市場信心。俄羅斯莫斯科交易所最新數據顯示，盧布匯率已回升至俄烏衝突前水平（黃河，2022 年 4 月 8 日）。

上述報導中的官方消息來源，指出俄羅斯雖受到戰爭和西方制裁影響，但俄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已使盧布匯率回升，金融風險得到遏制，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效果並不明顯，如：

主要源於俄羅斯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並不怕制裁……因俄羅斯對其他國家的制裁是有預判的，所以做了一些準備，抗壓能力較強（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5 日 b）。

以及引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發言，指出「在面對西方制裁時，盧布展現出很強的穩定性。」（南博一，2022 年 4 月 6 日），此框架主要圍繞國際制裁手段以及俄羅斯的反制手段展開，例證則多引用俄國央行、財政部、莫斯科交易所等的數據佐證。

在推理裝置上，此框架針對國際制裁對俄羅斯造成的經濟影響，以及俄羅斯的反制手段進行分析（問題定義），由於俄羅斯有一定的反制裁能力，西方聯盟對其的制裁效果有限（因果解釋），短期內俄政府將天然氣與盧布掛鉤，並與黃金脫鉤，使盧布與物價穩定（道德評估），但長期下去不是辦法，俄羅斯必須刺激國內經濟（解決建議）。

3. 「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

最後是「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此框架報導數量較少，甚至《人民網》樣本中沒有使用此框架的新聞，因此以下論述以《澎湃新聞》為主。其核心意涵為俄烏衝突對烏克蘭經濟造成的影響，報導內容傾向於陳述烏克蘭經濟損失，或國際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等。

框架化裝置層面，同樣使用字彙和例證，常見字彙有「萎縮」、「下降」、「損失」、「國防援助」、「資金援助」、「極為嚴峻」、「重創」等形容經濟負面的詞彙；例證方面多舉烏克蘭央行或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報告，佐證烏國經濟受到戰爭之影響程度。此外，有報導針對美國對烏的援助進行分析，在框架化裝置上使用了譬喻：

〈新聞分析 美國送烏克蘭的到底是「救命錢」還是「送命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很難說這是「保命錢」，這就是「送命錢」或者是讓烏克蘭某些人的「賣命錢」。其實這個背後和「租借法案」一樣，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利己的算計……美方事實上還是拱火、澆油這麼一個態勢，以便實現它

的利潤最大化，損害俄羅斯最大化這麼一個狀態（澎湃新聞，2022年5月11日a）。

上述報導將美國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譬喻為「送命錢」和「賣命錢」，並將援助背後邏輯比作「租借法案」，稱其行為是「拱火澆油」。租借法案原為美國國會在二戰初期通過的一項法案，以不捲入戰爭為前提，為盟國提供戰爭物資，而拱火澆油原意應是烹飪時的動作，這則新聞將「租借法案」的概念挪用至俄烏戰爭中的美國立場，並以「拱火澆油」形容美國行為將對烏克蘭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有關推理裝置，「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意指烏克蘭受到戰爭影響而引發一系列國內乃至世界的經濟連鎖效應（問題定義），由於烏克蘭作為糧食出口大國，將連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一步影響全世界（因果解釋），但有報導指出軍事援助可能使戰爭更加激烈（道德評估），應以資金援助支持烏政府提供基礎服務，並及時幫助烏克蘭重建（解決建議）。

綜合上述，「經濟影響框架」中使用數據作為事實依據，證明戰爭帶來的經濟影響。在處理俄國及烏克蘭所受影響時，面對各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媒體傾向使用俄方數據以佐證戰爭並未撼動俄國經濟，並敘述俄羅斯的反制手段，兩家媒體明顯站在親俄角度進行報導。但涉及國際經濟、美國議題，兩家媒體則再次呈現打美、反美的一貫態度，批判美國對烏的援助行為，凸顯在中美角力環境下，媒體見縫插針地顯現排外與反美的意識形態。

（四）道德框架

最後為「道德框架」，凸顯反戰、正義、公共利益或人權議題的報導，《澎湃新聞》使用此框架的比例略高於《人民網》；後者的報導以中國呼籲和平談話及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為主，但《澎湃新聞》除中方表態的報導外，更多呈現戰爭背後人情味的故事，引述許多外國民眾的意見作為消息來源，包括對各國難民的報導，透過對民眾的採訪回顧城市的歷史等。

框架化裝置上，首先使用字彙，常出現的字彙選擇有：「和平解決」、「全力保護」、「苦難」、「背井離鄉」、「庇護」、「千瘡百孔」等，如：

2月27日，俄烏戰事進入第四日，衝突不斷升級。平日裡安靜美麗的烏克蘭城市，不得不面對呼嘯而過的導彈，面對不斷響起

的空襲警報，面對被炮擊後千瘡百孔的樓房。人們無助、哭喊、驚恐……（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7 日）。

相對著重事件客觀報導的官方媒體《人民網》，《澎湃新聞》則以形容詞描繪戰爭，尤其在「道德框架」下對戰爭環境進行渲染，並圍繞著戰爭下的小人物進行報導。因此其使用的另一框架裝置為敘事，透過對小人物故事的敘述，對身處衝突下的人們進行採訪，以小見大地還原戰爭樣貌。

那天回答老師問題時，我聽到窗外劇烈的「咣當」一聲。俄軍襲擊了敖德薩當地一個軍用物資儲存地，發生爆炸。我看向窗外，隔著冬日稀疏的樹枝，遠處一團灰霧呈擴散狀態，伴隨黑煙冒出（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7 日）。

這方式還使用例證，舉聯合國難民署、美國國務院、德國內政部、人道主義走廊數量等數據作為有關難民接收、人道主義救援的論述依據。

「道德框架」主要有三種報導類型，首先是「呼籲和平」，這為《人民網》經常使用的報導起手式，以純淨新聞方式，引用中國官方及國際社會呼籲和平的宣言、各國的人道救援作為內容核心，如〈聯大主席呼籲俄烏通過對話解決爭端〉（王建剛，2022 年 2 月 25 日）、〈國際社會繼續呼籲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俄烏衝突〉（唐霽等人，2022 年 2 月 28 日）。

其次是「何以為家」，報導內容除陳述難民情況的純淨新聞外，《澎湃新聞》比《人民網》更多報導各國難民的遭遇，並且以深度報導形式呈現，如〈全球城市策略 | 為難民而規劃〉（澎湃新聞，2022 年 3 月 14 日），從「何以為家」、「何以為生」、「何以為民」三個角度，討論難民的安置、謀生、基本權利保障等問題；抑或是討論邊緣國家難民的何去何從，如〈俄歐邊緣中的摩爾多瓦：難民沼澤、戰爭疑雲與脆弱的平衡〉（喻曉璿、鄭江涵，2022 年 3 月 14 日）。《澎湃新聞》此類型範圍不僅限於俄烏兩國，更多地講述在此戰爭中邊緣族群之人權議題。

較為不同的是，《人民網》有關難民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報導角度以譴責西方「雙重標準」為主，指出第三國公民在尋求援助時受到種族歧視。

基於種族、族裔、國籍或移民等身份而選擇性地給予人道主義援助是不可接受的，它與人道主義精神格格不入。所以，西方國家以帶有偏見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選擇性方式開展人道主義援助時，

不僅會削弱人道主義精神所蘊含的善良與力量，還會讓世人更加認清西方國家對待人道主義和人權的「雙標」與偽善（毛俊響，2022年4月8日）。

而《澎湃新聞》則是透過對人物的實際採訪，呈現在波蘭擔任難民志願者的感受，如〈連線／志願者：在波蘭，烏克蘭難民受到最慷慨接待，非烏克蘭裔或遭冷落〉（南博一、林宇軒，2022年3月17日），文中還引述《衛報》等外國報導之內容，以此角度展現非烏克蘭裔難民遭遇的人道主義問題。

第三類則是「城市的悲鳴」，《澎湃新聞》有數則與俄烏兩國歷史、地緣政治相關的專題報導，爬梳歷史脈絡，透過人物故事串起社會變遷痕跡，如〈特稿／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上）、（下）〉（汪倫宇、喻曉璿，2022年5月11日；澎湃新聞，2022年5月11日b），以頓涅茨克人的成長經歷、國族認同等方面展開敘述，呈現兩國政治變動，影響、融入當地生活的種種痕跡。

推理裝置的部分，「道德框架」意指因戰爭引發的人道主義災難或公共利益之問題（問題定義），兩國地緣政治悲劇導致許多人道危機（因果解釋），當事方應遵守國際人道法，保護平民、減少傷亡，確保人員撤離和人道通道的安全順暢（道德評估），兩國應立即停火，透過對話和談判化解危機（解決建議）。

「道德框架」潛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現象與前文分析一致，《人民網》作為官方媒體，相比《澎湃新聞》較少以人情趣味、深度報導的形式呈現此框架，更強調呼籲和平的純淨新聞，彰顯中國立場與大國擔當，甚至再次批判西方「雙重標準」以劃分敵我，呼應官方的意識形態，完美充當政府喉舌；而《澎湃新聞》因其商業媒體定位，則在遵從黨國對事件詮釋的領導權威下，開拓深度報導的空間，講述災難背後的人物故事及人權議題等，迎合資本市場需求。

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量化及質化分析，呈現中國兩家網路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報導。結果發現，黨營的《人民網》與商業化的《澎湃新聞》，在俄烏戰爭中扮演的角色相近，與胡光夏（2007）、Thussu & Freedman（2003）的研究發

現有幾點雷同。首先，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新聞報導中充當了戰爭的批評者、批判戰爭的觀察者之角色，雖然不公開譴責交戰兩國，但兩家媒體在報導內偶有呼籲和平，反對戰爭的立場。

然而，不同於過往研究指出部分媒體介入戰爭，成為戰爭的工具或平臺，中國媒體並未積極扮演此次戰爭的啦啦隊，或鼓勵他國參加戰爭之角色，反而對交戰兩國的立場保持高度節制，為俄國說話同時，又同情烏克蘭。然而，中國媒體卻成為另一場意識形態戰爭的平臺，透過遠方烏克蘭的實體戰爭，為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增添火力，處處呈現中美兩國的角力。也就是說，中國的媒介平臺上，透過俄烏戰爭的報導形塑反美情緒，強化其民族主義。

戰爭新聞的再現受到媒體與國家關係的高度影響。Herman & Chomsky (1988 / 沈聿德譯, 2021) 的宣傳模式指出，即使是標舉新聞自由的美國，媒體報導戰爭新聞仍高度受到國家左右。威權國家的媒體更難脫離黨國力量的指令，中國媒體長期以來作為複製領導者政經框架的啦啦隊，在有關俄烏戰事、中美關係的議題上，不斷為中國的立場吶喊助威，加強民族自信、宣揚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並且見縫插針地將戰爭責任歸咎於美國、批判美國，與其形成意識對立。回應過往相關研究理論，在中美角力的環境下，中國政府利用「黨的公關公司」——新聞媒體，將其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在戰爭的責任歸屬聚焦於美國，進而在此議題中不斷塑造一致對外的民族情緒，彰顯中國形象（李金銓，2002；汪宏倫，2014）。

細究戰爭報導框架，過往文獻指出，在衝突與和平兩端中，媒體經常重現衝突場景；本文分析結果證實此論點，衝突框架是《人民網》和《澎湃新聞》最常採取的報導框架。而在經濟框架、責任框架、道德框架等議題的複雜牽動下，則出現人道、反戰的想法。在責任框架下，雖然不輕易究責於俄羅斯，卻反而主打反美牌，認為美國及北約要為戰爭負責，譴責民主盟國的經濟制裁行動，並抨擊美國從俄烏衝突中牟利。

從媒體屬性來區分，《人民網》和《澎湃新聞》在報導主題與消息來源上呈現差異。《人民網》傾向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高度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合理化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淡化俄羅斯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澎湃新聞》作為商業媒體，其報導走向和立場雖然不能偏離國家利益，但也形塑與官方媒體有所差異的報導風格，如以其他國家或人民作為消息來源，在道德框架中展現更多人情趣味的深度報導，盡可能迎合資本市場的需求，從中獲取利潤。此研究結果符合王毓莉（1999）、何清漣（2006）等人對於市場化

媒體的分析方向。

綜合觀察，中國媒體在建構俄烏戰爭新聞時，依循與俄烏兩國外交關係以及經濟利益的基礎，盡可能不得罪交戰兩國，但在新聞中仍頻繁引用俄羅斯官方消息來源作為報導依據，對戰爭的定義採用俄羅斯的官方用法，稱其為「特別軍事行動」。並且，兩家媒體在此事件的報導中，除使用過去研究發現所指出戰爭新聞常見的衝突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外，頻繁使用「美國應對戰爭負責」的責任歸屬框架，尤其是以《人民網》為例的官方媒體，以對美國的戰爭咎責作為最主要的報導框架之一。

本文分析中國網路媒體所建構的俄烏戰爭，及其背後凸顯的民族主義。研究結果顯示，傳播作為中國政府「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之主要途徑，誠如汪宏倫（2014）所言，中國媒體對外一致支持一個強大、維護世界和平的政府，建立主體意識，對內自上而下地動員普通民眾，以仇美、反霸權的「戰爭之框」劃分敵我，形成意識形態分割。從框架包裹分析結果可看出，此類新聞建構方式，已然形成詮釋俄烏戰爭的主要認知框架，並不斷以自我美化的方式塑造中國「除暴安良」的國際形象。

因此，不同於過往戰爭新聞研究，本文發現，中國媒體在實體戰爭的再現之外，積極建構一場虛擬的戰爭，動員民族主義情緒，為中美兩大強權角力增添柴火。亦即，中國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新聞報導，醉翁之意不在酒，實則利用俄烏戰爭，建構反美、反西方、反霸權的言論戰場平臺，媒體成為複製政府意識形態的啦啦隊，對內以「中國自我美化」宣揚民族主義，對外以「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形成批判美國的統一戰線。

參考文獻

- Bradsher, K. (2023 年 3 月 8 日)。〈習近平罕見公開批評美國對華採取遏制措施〉，《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30308/china-us-xi-jinping/zh-hant/>
- 人民網 (2022 年 3 月 15 日)。〈外交部：美國毫無資格自詡所謂「人權燈塔」〉，《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315/c1002-32375598.html>
- _____ (2022 年 4 月 6 日)。〈將經濟武器化必將反噬其身（鐘聲）——從烏克蘭危機看美式霸權⑥〉，《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406/c64387-32392108.html>
- 于瀟清、劉棟 (2022 年 3 月 17 日)。〈烏克蘭局勢發展讓中方越發陷入尷尬？外交部回應〉，《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62685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4 年 9 月 1 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01/c40531-25581189.html>
- _____ (2015 年 7 月 17 日)。〈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17/c397563-27322291.html>
- _____ (2016 年 02 月 20 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6/0220/c64094-28136289.html>
-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 (2022)。《2021 中國網絡媒體發展報告》。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上網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取自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4-27/doc-imcwiwst4217752.shtml>
- 毛俊響 (2022 年 4 月 8 日)。〈俄烏衝突暴露西方人道主義「雙標」〉，《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848.html>

- 王信賢 (2018)。〈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展望與探索月刊》，16 (5)：111-127。
- 王建剛 (2022 年 2 月 25 日)。〈聯大主席呼籲俄烏通過對話解決爭端〉，《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5/c1002-32359881.html>
- 王毓莉 (1999)。〈中共傳播改革之研究〉，《東亞季刊》，30 (1)：19-38。
- (2010)。《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的考察》。揚智文化。
- 朱瑞卿 (2022 年 4 月 11 日)。〈秘密軍事生物活動的幕後操縱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五〉，《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1/c1002-32396012.html>
- (2022 年 4 月 12 日)。〈劣跡斑斑的人權「偽道士」——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六〉，《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2/c1002-32397124.html>
- 何 舟 (2008)。〈中國政治傳播研究的路向〉，《新聞大學》，2：34-36。
- 何清漣 (2006)。《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黎明文化。
- 吳寶澍 (2022 年 4 月 8 日)。〈不擇手段斂財的趁火打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三〉，《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9/c1002-32395159.html>
- (2022 年 4 月 10 日)。〈揮舞制裁大棒的橫行霸道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四〉，《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10/c1002-32395437.html>
- 宋建武、羅賚、董鴻英、楊樂、王靜 (2015)。〈2014 全面推動媒體融合〉，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梅寧華、宋建武 (編)，《媒體融合藍皮書：中國媒體融合發展報告 (2015)》，頁 1-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忻 華 (2022 年 2 月 25 日)。〈俄軍“閃擊”烏克蘭：中東歐國家膽寒，歐洲內部正醞釀危機〉，《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50504
- 李子甜、徐美苓 (2020)。〈《人民日報》霧霾新聞框架建構 (2011 — 2017)〉，《新聞學研究》，142：59-109。
- 李志偉 (2022 年 3 月 16 日)。〈中國駐美大使刊文闡述關於烏克蘭問題立場〉，《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

people.com.cn/n1/2022/0316/c1002-32375860.html

李金銓 (2002)。〈中國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74：104-118。

——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牛津大學出版社。

汪宏倫 (2014)。〈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19：189-250。

汪倫宇、喻曉璿 (2022 年 5 月 11 日)。〈特稿 | 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 (下)〉，《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8014528?from=

沈聿德譯 (2021)。《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野人文化。(原書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Books.)

林穎佑 (2014)。〈烏克蘭事件後的中俄政經關係〉，《臺俄經貿》，16：38-45。

南博一 (2022 年 4 月 6 日)。〈歐盟外交官：歐盟不想卷入俄烏衝突，西方制裁之下盧布堅挺〉，《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480356

南博一、林宇軒 (2022 年 3 月 17 日)。〈連線 | 志願者：在波蘭，烏難民受到最慷慨接待，非烏裔或遭冷落〉，《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64510

施正鋒 (2016)。〈中國的民族主義〉，《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2 (2)：41-71。

胡光夏 (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與「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五南。

唐彥林、李蒙佐 (2022 年 4 月 13 日)。〈媒體刊文：美國是製造傳播生物病毒和精神病毒的“絕命毒師”〉，《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89508

唐霽、邢建橋、許正、劉宗亞、薛飛、卞卓丹、王建剛、高文成 (2022 年 2 月 28 日)。〈國際社會繼續呼籲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俄烏衝突〉，《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8/c1002-32361728.html>

- 高 頤 (2014)。〈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權性質的探討〉，《中國大陸研究》，57 (3)：1-38。
- 張 遠 (2022 年 4 月 7 日)。〈挑動俄烏衝突的煽風點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一〉，《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7/c1002-32393543.html>
- 陳昌鳳 (2015)。〈媒體融合中的全員轉型與生產流程再造——從澎湃新聞的實踐看傳統媒體的創新〉，《新聞與寫作》，9：48-50。
- 陳 籽 (2022 年 4 月 8 日)。〈漫評美式霸權之三：全世界瘋狂斂財的「吸血鬼」〉，《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478.html>
- 黃河、盧懷謙、黃澤民、劉芳、何麗麗、劉春燕、郝亞琳、王麗麗、華迪 (2022 年 2 月 24 日)。〈綜述：俄烏衝突風險驟升 全球主要市場動蕩加劇〉，《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224/c1002-32359182.html>
- 黃 河 (2022 年 4 月 8 日)。〈俄央行下調基準利率至 17%〉，《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929.html>
- 喻曉璿、鄭江涵 (2022 年 3 月 14 日)。〈俄歐邊緣中的摩爾多瓦：難民沼澤、戰爭疑雲與脆弱的平衡〉，《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7107460?from=sohu
- 曾繁旭 (2009)。〈社會的喉舌：中國城市報紙如何再現公共議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6 (3)：93-100。
- 賀 飛 (2022 年 4 月 9 日)。〈糧農組織：3 月全球食品價格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創新高〉，《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9/c1002-32395230.html>
-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 (編) (1989)。《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東華。
- 趙子忠、崔卓宇 (2014)。〈新媒體時代時政新聞如何突圍——也談澎湃新聞的競爭策略〉，《新聞研究導刊》，12：7-12。
- 劉 健 (2022 年 4 月 8 日)。〈破壞國際秩序的唯一獨尊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408/c1002-32394410.html>

潘忠黨 (2006)。〈架構分析：一個亟需理論澄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1：17-46。

澎湃新聞 (2022 年 2 月 25 日 a)。〈圓桌 「閃擊」烏克蘭首日，俄軍展示「混合戰爭」新戰力〉，《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842058&from=kuaibao

_____ (2022 年 2 月 25 日 b)。〈觀察 美歐多國制裁對俄羅斯經濟到底影響幾何？〉，《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16858930&from=wifiKey#

_____ (2022 年 2 月 27 日)。〈沒有人會代替我們戰鬥，我們將以自己的力量對抗任何敵人〉，《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6880636?from=sohu

_____ (2022 年 2 月 28 日)。〈歐洲委員會暫停俄代表權，俄外交部：已淪為西方政治工具〉，《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884004&from=kuaibao

_____ (2022 年 3 月 14 日)。〈全球城市策略 為難民而規劃〉，《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7099606&from=kuaibao

_____ (2022 年 4 月 12 日)。〈世貿組織年度報告：俄烏衝突危機全球貿易復蘇〉，《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7581155?from=

_____ (2022 年 4 月 6 日)。〈聯合國安理會審議烏克蘭局勢，俄烏圍繞布恰事件各執一詞〉，《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480369

_____ (2022 年 5 月 11 日 a)。〈新聞分析 美國送烏克蘭的到底是「救命錢」還是「送命錢」？〉，《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8032052&from=kuaibao

_____ (2022 年 5 月 11 日 b)。〈特稿 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上）〉，《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2 日，取自 <https://>

- 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7997320&from=kuaibao
- 戴瑜慧 (2019)。〈意識形態娛樂化：習近平新時代下的政治與流行文化雙重奏〉，《中華傳播學刊》，36：195-235。
- 聶舒翼 (2022 年 5 月 10 日)。〈海外網評：在美國眼裡，烏克蘭不過是拖垮俄羅斯的炮灰〉，《人民網》。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510/c1002-32418732.html>
- 顏建發 (2015)。〈烏克蘭危機與中國的戰略處境和選擇〉，《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1 (2)：51- 72。
- 羅世宏、魏均、馮建三、唐士哲、林麗雲、王菲菲、王賀白譯 (2005)。《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巨流。(原書 McChesney, R. [2004].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21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 Aday, S. (2010). Chasing the bad news: An analysis of 2005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 coverage on NBC and Fox News Chann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1), 144-164.
- An, S. K., & Gower, K. K. (2009). How do the news media frame cris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risis news coverag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5(2), 107-112.
- Berry, N. O. (1990).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ess an analysi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U.S. foreign policy*. Greenwood Press.
- Chomsky, N. (2002).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2nd ed.). Seven Stories Press.
- Dimitrova, A. K. (2001). Nightmares in the nightly news: CNN covers atrocities in Kosovo.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35(1), 1-46.
- Dimitrova, D. V., & Strömbäck, J. (2005). Mission accomplished? Framing of the Iraq war in the elite newspapers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67(5), 399-417.
- Fortner, R. S. (199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Galtung, J. (2000). The task of peace journalism. *Ethical perspectives*, 7, 162-167.
- _____. (2003). Peace journalism. *Media Asia*, 30(3), 177-180.
- Hallin, D. C., & Gitlin, T. (1993). The Gulf War as popular culture and as

- television dram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411-424.
- He, Z. (2000).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112-151).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olsti, O. 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ddison-Wesley.
- Kelman, H. C. (1995). Decision making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Gulf War: An assessment of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assumption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2), 117-130.
- Knight, A. (2003). The Hollywoodisation of war: The media handling of the Iraq war. *Global Media Journal*, 2(3), 1-10.
- Lasswell, H. D. (1927).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Knopf.
- Luther, C. A., & Miller, M. M. (2005). Framing of the 2003 US-Iraq war demonstrations: An analysis of news and partisan tex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1), 78-96.
- Moore, G. J. (2014, May 21). China's stake in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iplomat*. Retrieved January 10, 2023,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chinas-stake-in-the-ukraine-crisis>
- Neuman, W. R.,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mmo, D. D., & Combs, J. E. (1980). *Subliminal politics: Myths & mythmakers in America*. Prentice-Hall.
-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1), 55-75.
-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3). Asia-Pacific Sclerotic one-party regimes and media control by oligarch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etrieved July 10, 2023, from <https://rsf.org/en/classement/2023/asia-pacific>
- Schwalbe, C. B., & Dougherty, S. M. (2015). Visual coverage of the 2006 Lebanon War: Framing conflict in three US news magazines. *Media, War & Conflict*, 8(1), 141-162.
- Semetko, H., & Valkenburg, P.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93-109.

Thussu, D. K., & Freedman, D. (2003).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Sage.

Topoushian, M. (2002). *Interpreting the constructed realities of the 1991 Gulf War: A 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two Arab and two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s*. Concordia University.

van Gorp, B. (2007).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60-78.

Wimmer, R., & Dominick, J. R. (1991).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3rd ed.). Wadsworth Pub. Co.

Wolfsfeld, G. (2004). *Media and the path to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本文引用格式

鄒瞻舒、洪貞玲 (2023)。〈民族主義啦啦隊：中國媒體對俄烏戰爭的報導及角色〉，《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111-154。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5

Zou, Z. S., & Hung, C. L. (2023).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The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by chinese media and the media's ro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111-154.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5 [Text in Chinese]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The Coverage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by Chinese Media and the Media's Role

ZOU, Zhan-Shu

Master of Art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NG, Chen-Ling*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ussia-Ukraine war has been attracting global media attention. In China, a country that has good relations with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how did Chinese media outlets report this war? How were did national and market interests of China reflected by Chinese media through war news? Using van Gorp's framework wrapping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wo Chinese online media outlets, People's Daily (Renmin ribao) and The Paper (Pengpai xinwen), represented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in their report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reports by the two media outlets, one run by the party and the other market-oriente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forms of repor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reporting themes, and content frameworks. However, consisting with China's official position, their reporting stances were both neutral without biasing towards either Russia or Ukrain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among the four commonly-seen thematic frameworks, the conflict framework was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the two media outlets. The other frameworks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framework, the economic impact framework, and the ethical framework. After combined analysis of framing devices, reasoning devices, and underly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 war new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by reporting the news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the Chinese media outlets



世新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SHIH HSIN UNIVERSIT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傳播
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舍我 紀念館
Cheng Shue-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anti-American and anti-Western discourses and played the role of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Keywords: Anti-America, nationalism, the Russia-Ukraine war, frame package, war journalism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lhung@ntu.edu.tw
Received: 2023.03.12; Accepted: 2023.06.11